



# 戴小华《忽如归》家族书写研究

**A Study of The Family Writings of Dai Xiao Hua's *Hu Ru Gui***

纪心琪

**KEE XIN CHI**

**18ALB04995**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ANUARY 2022**

#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2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2-3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3-5
第三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5-6
第四节 研究范围	6-7
第五节 研究方法	7-8
第六节 初步研究成果	9
第二章 《忽如归》家族书写之伤痕叙事	9
第一节 伤痕的源头：家族变迁史溯源叙事	10-12
第二节 揭开政治屏蔽的家族历史创伤叙事	12
（一）身份之伤叙事	13-14
（二）身心之伤叙事	15
第三节 家族历史与记忆再现叙事	16-18
第三章 《忽如归》家族书写之主题意涵	19

第一节 流放者的精神放逐·····	19-22
第二节 “归”之想象与憧憬·····	22
(一) 肉体上的回归·····	22-24
(二) 心灵上的回归·····	24-25
(三)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26-27
第三节 走出白色恐怖：平复创伤的渴望·····	28
(一) “家——家族”的意象意涵·····	28-31
(二) 以爱平复创伤：家庭成员爱的力量·····	31-33
第四章 结语·····	34-35
引用书目·····	36-38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纪心琪 KEE XIN CHI

学号：18ALB04995

日期：2022年4月3日

论文题目：戴小华《忽如归》家族书写研究

学生姓名：纪心琪

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

校园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本论文以戴小华《忽如归》的家族书写为主要论述对象。小说以社会以历史为依托，阐述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一个台湾家庭的真实情况。1987 年“解严”之后，台湾社会语境更为自由，创作不再受到政权的压制，各个作家群体开始扩展不同的文学作品题材。其中，家族主题的作品逐渐广泛，直至 2017 年《忽如归》面世，戴小华也延续了家族题材的书写，但并非单纯地书写或建构家族历史，而是通过家族经历揭露隐藏在时代背景下的历史创伤。笔者于第二章探讨《忽如归》家族书写之叙事手法，采用王德威对“伤痕”的解释，探讨戴小华家族书写的伤痕源头，继而揭发在国民党撤退到台之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带来的历史创伤，也阐述戴小华再现家族历史与记忆的叙事手法。本文的第三章探讨《忽如归》家族书写之主题意涵，包括了流放到台湾——流放者的精神放逐，“归”之想象与憧憬，而后叙述戴小华以家族的爱平复创伤的渴望，借此走出白色恐怖。纵观《忽如归》，戴小华以细腻真实的手法展现故事人物命运的波澜起伏，与历史事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展现出浓厚的家国情怀。这一部忠实于历史事实和自我内心的写作，值得读者去深思其价值。

【关键词】戴小华、家族书写、历史创伤、离散、回归

## 致谢

大学时光，更甚于白驹过隙，终要流尽于指缝间了。我知道毕业论文的完成不是终点，知识的道路还很漫长。我的父母，感谢你们赐予我这四年的求学机会，虽然课业繁忙时我脾气暴躁，但是父母永远是对我包容度最宽的人，是我精神上最大的支柱。往后我必尽可能不让你们操劳费心。感谢李树枝老师，从论文的选题到最终定稿，都给予我无尽的指导和耐心。即使我总是延迟交稿，卡文的时候心情崩溃，但是老师还是不停鼓励我，帮助我完成这份论文。感谢宇航，我的明灯，亦师亦友，每次帮我解惑的是你，帮我找书的也是你。当然，免不了中文系几位小伙伴，苇薇、汶倩、海彤，挚友难寻，遇见你们是幸福的。感谢你们愿意在繁忙之中抽时间给予我课业上的意见与鼓励，当我诉苦的树洞，陪我一起痴人说梦，你们是我大学生活欢乐的泉源。虽然疫情让我们相互陪伴的时间不长，但已足感珍贵。

这四年里，我不敢说在中文领域中学术有成，但终究是成长了，也明白了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感谢那个坚持下来的自己，即使面对狂风暴雨依然咬牙挺到了现在。我深知自己的不完美，“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希望未来的我还能保持炙热的心一直往前方走去。

## 第一章 绪论

戴小华（1952-）是马来西亚著名华文作家，祖籍河北沧州，出生于台湾，跟随丈夫定居马来西亚，如今拥有马来西亚国籍。<sup>1</sup>1976年至1978年，戴小华先在马来西亚进修英语；1985年到英国剑桥大学参加密集课程的学习，进修莎士比亚的语言、戏剧和与莎翁同时期的戏剧。<sup>2</sup>戴小华曾担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及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长，<sup>3</sup>常年往返中马之间，成为书写中华文化的作家、传播者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使戴小华成为马来西亚著名女作家的契机在于她1987年发表的作品《沙城》。其后，戴小华出版过许多不同题材的作品，让戴小华成为马来西亚极度受人青睐的女作家。

长篇家族小说《忽如归》是戴小华的首次尝试。从开始到完成出版，前后耗时近20年。自从母亲回秀真在1999年去世，戴小华就开始酝酿这部小说，思考如何阐述戴家所经历的灾难。值得一提的是，《忽如归》是一本非虚构<sup>4</sup>的纪实小说，编织大陆人迁徙台湾背后的时代痕迹，刻画出70年代台湾戒严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让读者从历史的缝隙窥探流放者对故土的依恋和“有家归不

---

<sup>1</sup> 李媚，〈美貌与才华——马来西亚女作家戴小华小传〉，《东南亚纵横》2001年第5期，页44。

<sup>2</sup> 李媚，〈美貌与才华——马来西亚女作家戴小华小传〉，页45。

<sup>3</sup> 杜碧媛，〈从《忽如归》到《因为有情》——戴小华中传行暨“海外华文文学助力文明”对话〉，《名作欣赏》2019年第8期，页15。

<sup>4</sup> 在作者具有独立的价值向度前提下，对一段重大历史和某个人物的生活予以多方位，跨学科考察的文学性叙述。详见于蒋蓝，《踪迹史》，（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页2。

得”的悲哀。小说的副标题为“历史激流中的一个台湾家庭”。戴小华虽然只写了自己家庭的故事，但却正是台湾千千万万家庭的缩影。

虽然《忽如归》随处写下坎坷与苦难，戴小华却不沉溺于坎坷苦难中，而是用“爱”来反思和超越历史带来的伤痛，甚是难得。笔者以为，“爱”的叙事策略正是《忽如归》家族书写最主要的书写特点。

##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戴小华于 1952 年生于台中大渡乡。<sup>5</sup> 1949 年父亲随着国民党退居台湾，从此与大陆的亲族分隔两地，戴小华就是此时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外省人<sup>6</sup>。弟弟戴华光是书里重要的人物之一。<sup>7</sup>戴华光在美国留学后回台，与一些志同道合，有共同想法的同学如赖明烈，刘国基，开始呼喊大陆与台湾要统一的口号。然而，戴华光因此被认为是共谍案的同伙，被关押在牢。明白了国民党的真面目之后，戴华光在出狱之后便决定远离政治，回到大陆开了一间面包店，在故乡落叶归根。

戴小华的母亲回秀真，伴随丈夫来台之后便无止尽地想念大陆这片故土，尽述身居孤岛的寂寞和无奈。母亲的伟大与宽容给了戴小华发声的勇气。母亲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到大陆与亲人相聚，回到故乡安居乐业。然而，还没来

---

<sup>5</sup> 李媚，〈美貌与才华——马来西亚女作家戴小华小传〉，页 44。

<sup>6</sup> “外省人”原本是民间根据行政区分上省籍之不同相对“本省人”而称呼的“外省人”或“外地人”，后来在台湾语境中因省籍矛盾及排他性原则成为对 1949 年前后去台湾的大陆人的称谓。详见朱云霞，《“解严”以来台湾文学中的家族书写研究》（南京：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2012），页 43。

<sup>7</sup> 小说直接使用弟弟戴华光的名字。



得及实现这一愿望，母亲便逝世了。戴小华为了弥补母亲的遗憾，想尽办法让母亲的尸体得以运回大陆。

戴小华通过戴华光事件，不但还原“人民解放阵线案”的来龙去脉，更再现台湾戒严时期的“白色恐怖”历史氛围。解严之后，台湾外省人得以回到大陆原乡，《忽如归》在对家族的追忆及探寻归结出其核心就是一个“归”字，其揭示了一个大时代的流离和集体创伤记忆。瘥人的伤疤，受创的意识，也会在对亲密感的追求中、在家族成员爱的力量之下平复。

细读《忽如归》，笔者深深地被戴小华浓烈的原乡情怀和对家族的深爱所震撼，无论是戴小华展开家族书写的叙事手法，或是所陈述的历史背景，都值得读者去阅读及反思。

##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以“家族书写”的视角，切入研究《忽如归》的学位论文不多见，兹目前掌握了6篇直接或间接关于戴小华以及家族书写的论文。另，有6位学者针对戴小华的《忽如归》提出论述。辛金顺的〈戴小华《忽如归》的创伤记忆书写〉<sup>8</sup>主要探讨戴小华对家族的阐述中隐藏了的大时代的流离和集体创伤意识。辛金顺站在历史的角度去摸索大陆和台湾两岸几十年间的波涛汹涌，以一个时代的历史作为框架去再现创伤。

---

<sup>8</sup> 辛金顺，〈戴小华《忽如归》的创伤记忆书写〉，《焦风：政治与文学专辑》2019年第513期。

王红旗的〈用爱“缝合”被撕裂的“家国痛史”——谈马来西亚华裔女作家戴小华的“非虚构”长篇新作《忽如归》〉<sup>9</sup>和王艳芳的〈“真”的回归与“爱”的唤起——论马华作家戴小华长篇小说《忽如归》〉<sup>10</sup>都论述了小说另一大主题意涵，即家族的爱足以弥合被政治、社会乃至国家撕裂的伤疤；叙述中“回归式”的反思与渴望，也愈化成一种忠贞不渝的家国情怀。王红旗认为，戴小华还在“众所周知”的历史上以大量的史料和家书去揭发那个年代的家国痛史，用最真实的故事去填补历史的空缺；而王艳芳认为，“归”指的不仅是戴家成员历经波折终于回归故土的历程，更指向两岸和平统一，回归平静的心愿。

杜碧媛编辑的〈从《忽如归》到《因为有情》——戴小华中传行暨“海外华文文学助力文明”对话〉<sup>11</sup>补充了戴小华创作《忽如归》的过程和心路历程。期刊论文记载了在中国传媒大学大悦城与戴小华、王红旗、汤俏和张勇耀的访谈对话，包括了三位对戴小华个人及其作品的评价。

朱云霞在《“解严”以来台湾文学中的家族书写研究》<sup>12</sup>结合大陆与台湾对于“家族书写”的论述，进而指出其对于“家族书写”的界定：严格来说不是文类上的区分，而是从作品的主题内涵，以作品的实际情形与历史条件作为主要的思考面相与依据。<sup>13</sup>朱云霞认为，“家族书写”的文本并非仅以“家族”作为题材，更应该注重其对于家族的探寻、追忆和思索，通过家族个体命运去

---

<sup>9</sup> 王红旗，〈用爱“缝合”被撕裂的“家国痛史”——谈马来西亚华裔女作家戴小华的“非虚构”长篇新作《忽如归》〉，《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sup>10</sup> 王艳芳，〈“真”的回归与“爱”的唤起——论马华作家戴小华长篇小说《忽如归》〉，《名作欣赏》2019年第4期。

<sup>11</sup> 杜碧媛，〈从《忽如归》到《因为有情》——戴小华中传行暨“海外华文文学助力文明”对话〉，《名作欣赏》2019年第8期。

<sup>12</sup> 朱云霞，《“解严”以来台湾文学中的家族书写研究》。

<sup>13</sup> 朱云霞，《“解严”以来台湾文学中的家族书写研究》，页5。

反思历史。本文主要以朱云霞对“家族书写”的范畴去界定何为家族书写，借鉴其对文本的主题意涵、叙事特征和美学价值去探索《忽如归》。

此外，李敏的《“伤痕”与“反思”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sup>14</sup>，主要探讨伤痕中的创伤叙事。笔者主要借鉴文本的第四章——“创伤”的呈现与遮蔽通过其对历史创伤的阐述，了解到台湾戒严之后因政治黑暗而被覆盖的历史真相，从中探寻历史为台湾外省人带来的身心的伤痕和衰败，以此达到反思历史之效。

戴小华的个人生平经历，可透过网上搜索的各种新闻和访谈记录去侧面了解她对原乡的情感、创作初衷。笔者认为研究戴小华小说的论述比较少，原因在于学者把研究重心放在戴小华的散文集上，对小说的探讨不深入。除了以上几位学者，甚少学者把研究视角集中在单篇作品上，多将戴小华的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品做比较，研究戴小华整体作品的文学价值。

### 第三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承接上文，笔者的研究意义在于希望扩大前人的研究视角，为戴小华作品的学术研究增加一些新的领域。前人虽略有阐述戴小华的家族书写，但是还没有足够详细的阐述论证，因此笔者希望通过自身研究，加以丰富前人的观点。故此，笔者借鉴辛金顺的历史角度，把历史结合家族书写去研究《忽如归》，

---

<sup>14</sup> 李敏，《“伤痕”与“反思”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济南：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更多地集中在“家族书写”方面，补充学者如辛金顺、王蒙、王红旗、王艳芳、朱云霞、李敏等的论点，为其家族书写之叙事与主题意涵开展研究。

本论文设题为〈戴小华《忽如归》家族书写研究〉，主要是想探索戴小华如何通过书写家族历史，阐述一个埋藏在历史岁月下的真相，暴露两岸过去和现在交互切割的缺口。

本论文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戴小华如何开展家族书写的叙事手法？二，戴小华《忽如归》的主题意涵包括了什么？笔者希望通过本文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包括探讨家族书写的叙事手法，分别是伤痕的源头：家族变迁史溯源、被屏蔽的历史创伤、家族历史与记忆再现。此外，笔者也借着三个部分来彰显《忽如归》家族书写之主题意涵，分别为流放者的精神放逐、“归”之想象与憧憬和走出白色恐怖：平复创伤的渴望。

《忽如归》是特别的，不仅书写了自己家族的历史，更因为家族成员的遭遇，连接海峡两岸两个政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复杂关系。研究其家族书写叙事手法和主题意涵有助于推进戴小华家族书写的研究。

#### 第四节 研究范围

《忽如归》于 2017 年开始发售，小说有二十一章，时域横跨了两岸的历史时期。小说的叙述空间包括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同时还牵涉马来西亚和美国等地。小说使用了回溯的方式去再现历史，叙述方式是使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者“我”，即戴小华本人，去描述这段亲眼见证和参与的家庭、族群迁移和回归的历程。

内容方面，笔者将研究重心分为两条主线，一是描写作者母亲病逝之后，通过各方的努力与协助，将母亲遗体运回大陆，并与父亲最终合葬在沧州的土地上；二是叙述大弟戴华光在台湾戒严时期因呼吁“国家和平统一，不让民族撕裂”而判处无期徒刑。在这两件事件中，笔者再以家族书写之叙事手法和家族书写之主题意涵作为本文研究两大范畴，这些将在下文进行论述，故不赘谈。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本文将会以文本细读法<sup>15</sup>的方式对《忽如归》进行详细的分析。运用文本细读法的目的在于分析《忽如归》这本小说的层面意义和内涵意义，透过感受作者词句中隐含的个人情感，继而窥探历史的真面目。

此外，本文也运用王德威对于“伤痕”的解释，剖析戴小华创作《忽如归》的主要原因。在台湾实行长达 38 年的戒严时期，即 1949 年到 1987 年间，戴小华和弟弟戴华光、戴国光都在台湾出生。戴小华经历了戴华光事件，再现台湾戒严时期的“白色恐怖”历史氛围，这在她心中埋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即使历史事件已经过去许久，但是伤疤不会随着时间消失，当历史再次被提起，伤疤还是会被撕裂，人们还会记得伤痕之痛。《忽如归》正是戴小华因为历史的伤痕而创，是她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

再者，本文也使用新历史主义批评法去评析《忽如归》所涵盖的时代背景，并以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以及社会生活等环境做出进一步的分析。本文主

---

<sup>15</sup> 所谓细读，就是将文本中的语言做出详尽分析和解释，在小说的冲突和张力的基础上掌握小说的内涵。详见王先霏、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 181。

要运用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其认为历史不完全等同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是被叙述出来的，人们只有借助语言才能接触认识、去接触那转瞬即逝，不可重现的历史。<sup>16</sup>由此，历史是主观的，历史学家在发现历史事实隐含的故事时，实际上已经对历史事件加以自我阐述。因此，本文会借由新历史主义批评法探讨戴小华如何在还原历史的同时编入自己的主观感受，在传统历史上加以“真实”历史。

不可抗拒的历史巨轮，给戴小华留下了创伤，只有亲族的爱，才能去弥合受伤的灵魂。因此，本文借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所讨论的“空间的形象”，去探索戴小华渴望的幸福空间，以及她如何在这个空间里得到亲密感。本文将会借此理论去分析戴小华书写的家宅和地窖意象，论证戴家成员对于亲密感的渴望和追求。这两种空间都是想象的空间，正是因为历史带来的伤痛让人失去幸福感，只能在想象的空间中去追寻得以让自己安全和亲密的感觉。

笔者也将从简政珍的放逐视角去探索退居台湾的大陆人的放逐意识，以戴小华的家族展现数百万人因为政治造成的放逐情景。有家归不得是流放者深埋在心的苦涩，流放到台湾的大陆人心心念念都想要回到原乡。他们依然无法视居住了几十年台湾为自己的家，精神上的放逐让他们的心灵无处安放。戴小华的家族书写正是借由描述家庭成员怀念故土，抒发对原乡的情感及疏解心中离散造成的郁结。

---

<sup>16</sup> 海登·怀特，《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北京：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75。

## 第六节 初步研究成果

透过以上的研究，笔者得出《忽如归》的家族书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戴小华在家族书写之叙事手法上紧密结合家族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其中也包括了台湾的历史事件。戴小华以历史伤痕作为《忽如归》的书写动机，揭发被屏蔽的历史创伤。戴小华对客观历史的尊重仍有，但在叙事上加了主观历史概念之后便不是如同编年史般照图解说历史，而是将历史事件放置在家族事件中，历史事件本身只是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

第二，《忽如归》的主题意涵展现了流放者有家归不得的悲哀，但更多的是彰显家族爱的力量，以爱去弥合创伤。历史带来的伤痕，虽然愈合了但还是会有印记，这个印记就是戴小华家族书写的基础。戴小华以印记抒发流放者被放逐的精神，刻画国家动荡不安的历史现实，最终身心都得以回归故土的安稳。同时，戴小华在铭记伤痕的同时在这个根基上构建爱的力量，祈求走出白色恐怖带来的伤痛，不仅追求想象中亲密幸福的家与家族，更用家族成员的关怀与爱去平息历史带来的伤痛，借此化解心中块垒。

## 第二章 《忽如归》家族书写之伤痕叙事

“伤痕”一词，在词源学上释义为伤疤，也指物体受损后留下的痕迹。伤痕不仅可阐释为物质层面上实际伤疤的存在，乃延展至精神上的心灵伤痕。王德威言：“伤痕是一种记号，指向身体非经自然的割裂或暴露，最终又得以痊愈、弥合的痕迹。话虽如此，只要伤疤的痕迹仍存在，人们就会记起暴力的曾经发生……在审视个体伤痕的同时，记忆被唤醒，一个隐含的叙事於焉成形。”<sup>17</sup> 当这些记忆进入文学叙事，“记忆”会因为叙述者自身主观态度和想法而有所改变，以达到展示和自我安抚的目的。伤痕埋藏身心曾经遭受的暴力现场，成功保留了那段苦难和创伤的记忆，叙述者也能通过揭开伤痕来向世人重现历史事件带来的悲痛。这个伤痕就是戴小华在《忽如归》中家族书写的基础，创伤起源于国家的政治实践，而叙事的目的在于反思政治实践本身的失误，不奢求愈合伤疤，只希望化解心中的郁积。因此，本章会就伤痕的源头，即戴家家族史变迁溯源开始展开论述，继而揭开政治屏蔽的家族历史创伤，以及探讨戴小华再现家族历史与记忆的手法。

### 第一节 伤痕的源头：家族变迁史溯源叙事

戴小华以叙述家族变迁史溯源作为伤痕的源头。戴氏在明清沧州“戴刘吕王，于迟孙庞”八大家族中居于龙头地位，<sup>18</sup>彼时山西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景象，戴家

---

<sup>17</sup> 王德威，《一九四九：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08），页8。

<sup>18</sup> 戴小华，《忽如归：历史激流中的一个台湾家庭》（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页10。下文及脚注将会简化为《忽如归》。



的繁盛景象可想而知。然而，从明洪武初年，明朝为了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元年至永乐十五年（公元 1417-1468 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十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戴家就是在永明年间迁大户充基辅是到了沧州。<sup>19</sup>这一次的离乡背井，移民大多数都是被逼的。因此长辈为了让孩子们记住自己的祖籍，在每个人脚上的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至今大槐树的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sup>20</sup>戴家至此，开始了变迁之旅。

1937 年日寇占据东北，进而侵华。中国人民人心惶惶，同年二月间戴小华的大伯戴克明想带全家南迁免遭祸殃，但祖父母怎么也不愿离开，“我们这么大年纪啦，死也死在家里吧！不能将这把老骨头扔在外头啊！”<sup>21</sup>由此可见，老人是不愿意离开久住的故土，宁愿死也不要流落在外。之后，大伯戴着家属包括戴小华的父亲踏上南下的征途，几经转折来到了张夏，一个叫红石岭村的小山庄安家。

然而，大伯在 1937 年抗战时殉职，家人失去了靠山，在他乡又举目无亲，迫于无奈之下只好逃回老家天津。戴家在兵荒马乱之中自身难保，爷爷还曾被汉奸来村讨伐，绑在一棵树上鞭打，后又轧杠子、灌凉水，最后是二伯向亲友凑钱赎回爷爷的。<sup>22</sup>在那个年代，人民都苦不堪言，几经转折还是难以找到一处安家之地。一直到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接手山东省，三伯、父亲与六叔都为蒋介石的山东省省政府工作。1949 年，母亲跟随在国民党中任职的父亲从海上登上了大陆开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漂洋过海到了台湾。<sup>23</sup>随着台湾颁布戒严令，此后父亲和母亲便与故乡的亲人相隔两岸，开始了在台湾颠沛流离的生活。

---

<sup>19</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10。

<sup>20</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11。

<sup>21</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11。

<sup>22</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12。

<sup>23</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16。

戴家从历史的源头就一直在搬迁，其后经历了亲人因战争而逝世，被迫离开原乡过着流落他乡的生活。自日本攻打大陆，伤痕已经形成，刻在祖上三代人即戴小华的祖父母心中。一直到戴小华的父母离开大陆，家族在动荡的社会最终迁徙到海峡之外。戴小华虽然对于家族变迁的伤痛倾述是个人性的，但是也看到这种伤痛实际上也是属于整个民族的，它并非只是少数人的不幸遭遇。而且，由于制造这种创伤的根本原因来自于政治统一的暴力迫害，在这个层面上，戴小华叙述的历史搬迁之痛就是公共性的。因此，这段叙述也从家族的历史记忆，随之显现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揭露政治动乱带给整个民族的灾难。于此，伤痕在家族随着时代的动荡从故乡迁徙中产生。

## 第二节 揭开政治屏蔽的家族历史创伤叙事

“创伤”是什么？创伤是个人留在身上的伤疤，抑或是留在精神上的伤痛。创伤可以来自于他人、社会、政治，甚至自己。创伤主要是个人的，但当许多人因为遭遇共同的历史事件而汇聚创伤时，创伤就会有一个集体的名字：时代的、国家的、民族的。从大陆退居台湾的大陆人，原本居住在台湾的内省人，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集体进入所谓“白色恐怖时期”<sup>24</sup>。国民党为了巩固政治主导权，肃清政治敌对者，因此操纵司法，将政治异己犯罪化，让数以万计受难者遭受冤案、错案、假案等不当判决。随着台湾宣布解严，台湾民族意识到这只是政治党派蓄意制造的历史权威，其中白色恐怖带来的伤害，也是滥用国家暴力，践踏人权的佐证。戴小华痛定思痛，重新打开伤痕，追究潜伏于历史深处政治带来的创伤。其中，贯穿《忽如归》历史大背景

---

<sup>24</sup> 不论在人身自由、政治上及经济上与宪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权，都收到当时执政者的权威统治，以及当时立法者以及司法肆意之侵害，实可谓是台湾人权最黑暗之一页。详见倪子修、吴祚丞，〈戒严时期处置叛乱犯之特别实体法及程序法〉，《台湾人权与政治案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12月8-9日，页3。

的便是涉及戴华光的“匪谍案”。于此，本文主要概括的创伤为二：一，身份之伤叙事；二，身心之伤叙事。

### （一）身份之伤叙事

《忽如归》中人物的身份之伤，集中在戴小华的大弟戴华光上。戴华光因“匪谍案”被逮捕，这件历史事件贯穿整部小说，彰显出人物因被指认有罪而失去原有的合法平民身份，成为罪人。他被认为是“人民解放阵线”首领，连同赖明烈、刘国基被认为是其同党，因此一同被关押进牢。事件的起因，始于他们从美国一回来就开始呼吁抵制日货和美货，而且经常在晚上和几个朋友去大学校门口卖一些‘禁书’，发放两岸和平统一，抗日反美的传单。<sup>25</sup>因此，他们被按照“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及其相关条例”判决，戴华光被判处无期徒刑；赖明烈判处 15 年；刘国基则判处 12 年。<sup>26</sup>

1949 年国民党撤退台湾，为了坚守最后的弹丸之地，在岛上大举肃清异己，树立自己的威严。继五月十九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而后开始了高压统治长达 38 年的戒严<sup>27</sup>时期。那时候的台湾大街小巷都贴满“反共抗俄”“杀猪（朱）拔毛”“保密防谍”“检举匪谍，人人有责”“知匪不报，与匪同罪”等标语，加上午夜宵禁，白天也有临时戒严封锁交通，整个社会沉浸在警察国家的恐怖气氛之中。<sup>28</sup>

---

<sup>25</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36。

<sup>26</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41。

<sup>27</sup> 就定义上而言，戒严是指国家在遭遇战争或非常事变，为维护社会治安，于全国或特定区域，施以兵力戒备，且警备地区内民政机关之职权移归军政机关行使，并对人民自由权利得以停止或限制之意。台湾从 1949 年 5 月 20 日宣布戒严，至 1987 年 7 月 14 日解严，这段戒严的时期也被称为“白色恐怖时期”，因为不论是在人身自由、政治以及经济上于宪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权，都受到当时执政者的权威统治，以及当时立法者及司法肆意侵害，可谓台湾人权最黑暗的一段时期。详见于吴宥霖，〈从法治国原则论台湾戒严时期制定特别法与审判之探讨〉，《台湾海洋法学报》2017 年第 25 期，页 115。

<sup>28</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36。

台湾于 1950 年 6 月 13 日制定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全文共 15 条。当时制定此法的目的，是政府宣称为防治匪谍渗透所作出的整肃动作，但实则因国民党政府认为当时共党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于军队没有中心思想，为了使能在退守台湾之后也牢牢抓住军队，因此创设出所谓“匪谍”假想敌，作为全民一致的公敌，讲检肃匪谍列为全民工作。<sup>29</sup>但是，这项律法最终的实施结果却是无论何者，只要在政治上与党国持不同意见者，都视为异议分子或共党的同路人，统统归纳为“匪谍”，加以处刑。

依检肃匪谍条例规定的内容来看，其中其实有诸多弊端和不合理处。当时被认为是参与“匪谍”的人，就连只要发过一句牢骚，看过一本禁书，进了一次大陆的国货公司，登了一幅被认为有影射当权者之嫌的漫画，都算是“匪谍”。<sup>30</sup>根据条令，检举匪谍之人及办案有功人员皆有奖金，这无形中造成大量匪谍的冤、错、假案。为了破获大案，有的警察甚至“严刑逼供，迫使嫌犯屈打成招，甚至会编造许多莫有虚名的罪名，给嫌犯扣上多项帽子，以求升官受奖”<sup>31</sup>。不仅如此，根据台湾“法务部”向台湾“立法院”提供的一份报告资料显示，在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时期，台湾军事法庭受理政治案件 29407 件，受难者约 14 万人，他们都是“白色恐怖”的牺牲者。<sup>32</sup>由此证明，戴华光案件只是一个被夸大和扭曲的政治冤狱，戴华光更只是众多受害者之一，还有更多的人也遭到身份之伤，扣上罪人的称号长达十几年。

---

<sup>29</sup> 详见倪子修、吴祚丞，〈戒严时期处置叛乱犯之特别实体法及程序法〉，〈台湾人权与政治案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 年 12 月 8-9 日，页 7。

<sup>30</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36。

<sup>31</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36。

<sup>32</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103。

## （二）身心之伤叙事

《忽如归》中的身心之伤，是由“身份之伤”引发的，不仅造成身体的外在伤害，对精神也有一定的创伤。戴华光因政治而遭受的身体伤害便来自监禁。台湾当时的监狱并不公平公正，在管理者、统治者权力腐化的时代，违背狱方话语权的罪犯都会遭到惩罚，而戴华光好主持正义和打抱不平的性格让他在监狱受了不少折磨。他在绿岛监狱里面至少被关过四次黑牢，上过一次脚镣，踢破两道监狱门。黑牢的地是湿的，面积很小，人只能蜷曲着，牢门开了一个小洞，是送饭用的，戴华光甚至在里面打坐，大声唱大悲咒并绝食抗议。<sup>33</sup>牢狱带给戴华光的屈辱和痛苦，随着合法身份被剥夺，身心伤害相伴而生，越演越烈，之后更给戴小华寄出绝命书，显然已有想要解脱的念头。

戴华光在狱中还认识了一个类似“乩童”，名叫吕耿沛的诈骗犯，并奉那个人为恩师。在之后种种线索的佐证下，戴小华推测吕耿沛是国民党安排在戴华光身边以防他自杀的傀儡，利用通灵神算的诈术，让当时病入膏肓的戴华光盲目相信他，做出许多身心受创的事。例如吕耿沛让戴华光练习气功自救，又不经由正规师傅指导，导致之后的走火入魔，“大弟的‘脑火’在狱中发生过一次，在完全失控的状态下不仅将一只猫摔死，自己还撞墙寻死”<sup>34</sup>。种种身心的创伤，是戴华光入狱后的巨大哀痛，以至他出狱之后，就决定远离政权，不再插手政治之事。

---

<sup>33</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82。

<sup>34</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186。

### 第三节 家族历史与记忆再现叙事

面对所经历的历史创伤，戴小华选择将其以第一视角的形式去呈现家族小说中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正是这第一人称的视角，真切直接的场景交换与叙事方式冲击读者的心灵，借助现实的在场感让整体叙事变得更加真实。戴小华在民间挖掘历史，用自己与家族的经历结合证据去叙述在台湾戒严时期，因当时政治权威而被屏蔽的真实历史。正如海登·怀特所言：“历史不完全等同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是被叙述出来的，人们只有借助语言才能接触认识、去接触那转瞬即逝，不可重现的历史。”<sup>35</sup>由此可见，历史是主观的，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会对其加以自我阐述。例如戴小华在创作《忽如归》的时候严格遵照历史史料，加上自己的阐述：“近十几年来不断探寻和搜集资料……费尽心思，查询真相，仅是想以自己的方式去接近历史……因为我认为历史的真相需要不断补充，历史的延续需要不断诉说”<sup>36</sup>。历史所谓的真面目，昭示的只不过是某种权力的合法化，等待叙述者用自己的角度再次将其补充说明。

戴小华重现真实历史，体现在对家族历史与记忆进行叙述时呈现多样化的再现。不仅是以语言文字对史籍进行改编叙述，还在文本中加入资料性的图解、相片、日记、书信等，形成语言与影像的互文。戴小华在叙述弟弟戴华光事件中，运用了大量史籍，揭露国民党为了扩大对人民思想及言论的控制，并巩固统治期间的政权利益，在戒严期间设立种种律法，特别是对叛乱犯给予特别法规处置。作为“戴华光事件”的见证者，戴小华并没有在开篇就揭露政治黑暗，而是利用新闻探究，附上案发参与人的证词，以及媒体社会各方面的质疑与言论，抽丝剥茧地一层层揭开带华光案件背后所隐含的政治目的，可谓条理分明。

---

<sup>35</sup> 海登·怀特，《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北京：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75。

<sup>36</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110。

戴小华揭发戴华光事件其实是一场政治阴谋，例如引用香港《星岛日报》佐证台共谍案政治动机，目的是为了禁止在岛上民族主义意识。<sup>37</sup>此外，当年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也指出带华光是因为与匪统战刊物《七十年代》总编辑李怡联络，成立“人民解放阵线”制造暴乱，才将他逮捕。但是在1988年李怡被《新新闻周刊》邀请入境台湾公开演讲，不仅证明了警总的自相矛盾，加上李怡在台湾耕莘文教演讲会上更是否认与戴华光认识，加以证实戴华光的牢狱之灾是无辜的，一切都是警总的预谋：“李怡中队长和李怡总编辑并非同一个人，台湾情治单位为了破获“破获匪谍”的巨额奖金，硬扯上李怡这个错误的线索”<sup>38</sup>。

此外，戴华光在狱中的种种谜团，在不断被揭秘的过程中，事件脉络逐渐清晰。随着事件的进展，戴小华将自己和戴华光的往来信件、戴华光在狱中写的日记以附录的形式编排进小说，让戴华光自己言说。他的记录与戴小华的叙述相互解释，让读者顺着戴小华的步伐揭开之前埋下的伏笔。不仅如此，在《忽如归》全书的末尾还附上戴华光的狱中家书的绝食血书，更添历史事件的真实感。

同样，在戴华光被逮捕入狱时，他的大姐就怀疑举报人是其女友的父亲。原因是戴华光最亲近的女朋友不在逮捕的名单内，而且在当时检举匪谍分子可以领功得赏，因此女友家人或许会因为丰厚奖金举报戴华光。但是，戴小华之后在警总军法处解密档案中看到对戴华光侦讯笔录的文件，发现戴华光在服兵役期间认识一位叶某，更在另一份解密文件中证实正是叶某向警总举报戴华光，而非其女友父亲。如此一来，戴小华运用推理和论据佐证的手法，将书信、文告、解密档案、笔录、照片、过去的

---

<sup>37</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39。

<sup>38</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12。

新闻报道等等作为证词来推翻历史。这些物件成为叙事的载体，真实且不加修饰的档案会述说历史，以求保存真实历史事迹。

戴小华在《忽如归》开篇置放了许多图像作为叙述的论证，其中包括了母亲回秀真和父亲戴克英的合照、戴家全家福、戴华光狱中所写书信、各界媒体对“戴华光案”的报道等。图像作为已经被定格的“过去”，具有强烈的召唤力，承载着叙述者的情感，强烈直白地呈现于读者面前。正如罗兰·巴特所言，在“时至今日，还没有任何图画艺术品能够让我确信一件东西从前存在过，若让我确信，必须通过别的中介；可是通过照片，我立刻就能够确信，世界上没有什么人能让我以为那是假的。”<sup>39</sup>换言之，图像本身就具有保存真实历史的能力，通过图像进入所在场景，仿佛时空凝结，得以寻找已逝去之物。因此，戴小华利用图像本身就成为独立的叙事线索与故事承载，再现家族故事。

---

<sup>39</sup> 罗兰·巴特著，赵克非译，《明室：摄影纵横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页181。



### 第三章 《忽如归》家族书写之主题意涵

《忽如归》这部小说的主旨归咎于一个“归”字，“归”的意蕴多处可见。小说书名取自曹植《白马篇》中最后一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sup>40</sup>。全书的每一章章名均由四字词语构成，一直到最后一章的章名“梦回家园”，以“归”开始，再以“归”完结。解严之后，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原乡大陆与台湾移民的生活再次有相互交织的机会，家族记忆再现复调历史。“归”蕴含着戴小华对家国历史的感悟；是戴华光为了祖国统一宁愿牺牲小我，勇敢抗争的精神；是他经历十多年牢狱最终回归故土的尘埃落定；是父母流浪漂泊小岛半生之后想要归乡安葬的心愿；也是戴小华历经世事沧桑，回到故乡时的落叶归根之感；是一种心灵得到归宿的平静安宁。小说的叙事围绕着“归”的意涵层层展开，家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历史掀起一波波浪潮，最终会在爱的力量下回归平静。戴小华的家族书写不仅呈现伤痕，更进一步审视历史以求获得超越历史创伤的途径。是以，本章将以流放者的精神放逐，“归”之想象与憧憬及走出白色恐怖：家庭成员爱的力量来加以阐述《忽如归》的主题意涵。

#### 第一节 流放者的精神放逐

原乡，从语法上来讲，属于偏正式结构。它意指“乡”，却重在“原”。“原”代表着时间的向度，指涉过去，表示“最初的”“开始的”“原来”“本来”之意。因此，对于“原乡”的思念，其实就是因为“乡”的离失，流放者之所以会有精神放

---

<sup>40</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序。

逐的现象，就是因为失去了原乡的安全感。1949年前后，数百万大陆各省军民因国民党军事的溃败而撤退到台湾，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产生庞大的放逐社会”<sup>41</sup>，至此揭开了放逐时代的序幕。

戴小华的母亲回秀真和父亲戴克明便是书中的流放者，陷入到无法返回原乡的无助命运中。他们和其他流放到台湾的大陆人为外省第一代，在赴台暂居台湾初期，都做好随时要回到大陆的准备。他们不甘心将家国认同从偌大的大陆版图放置在台湾岛屿，意念里“中华民国”的核心是大陆。但是，这个信念随着政权更迭，政治的残酷作为而薄弱化，他们认清了台湾作为现实生活居住处，意识却还是把大陆当作“家”，这无异是精神放逐。寄居台湾，大陆流放者只觉得自己是这座岛上的过客，在岛上生活时乡愁占据精神大部分时候。面对陌生的土地和未知的未来，唯有怀乡来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和归宿。

简政珍认为，放逐母体牵系着的是被迫远离乐土，远离一个情感上认同的家，因此他可能转化为失乐园或乌托邦的寻求，人在这些未确定的空间里寻找归宿感。<sup>42</sup>不能回家的痛苦是是流放者深埋在心的苦涩，每当回忆其故乡都会悲痛难忍，就如戴小华的母亲怀念家乡的亲人时，都会默默流泪，“即使有再多的牵肠挂肚，也只能看着几张过时的照片唏嘘一番”<sup>43</sup>。那时候因“二·二八事件”<sup>44</sup>，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憎恨达到了顶端，戴家除了忍受与亲人分离的悲痛，还要遭受台湾本省人的欺压，对回归故乡的盼望达到的顶峰。正如简政珍言，故土已丧失实质，消融于记忆，但放逐地和

---

<sup>41</sup> 简政珍，〈放逐文学——台湾放逐文学初探〉，《中外文学》1991年第6期，页10。

<sup>42</sup> 简政珍，〈放逐文学——台湾放逐文学初探〉，页4。

<sup>43</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22。

<sup>44</sup> 1947年2月27日傍晚，一位在街头靠卖私烟维持生计的寡妇被前来取缔的台湾省公卖局职员殴打，导致与民众发生冲突，职员开枪威胁，其中一位民众被流弹射中而死亡。次日28号，民众赴行政长官公署抗议却遭到卫兵开枪，民众有死有伤，此举动引爆全台北市陷入暴动状态。情绪激昂的民族只要发现对方是外省人就殴打，台湾民众对外省人族群性的反感达到顶峰。详见于若林正丈，《战后台湾政治史：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历程》，页53。

故土无以比拟，异地的存在往往触发对故土的缅怀。<sup>45</sup>在面对当地主流族群的时候，他们只有认同位于远处的原乡，才会挽留一丝尊严感及归宿感。纵然那种归宿感只能是想象中的认同，然而当对自己的想象产生认同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居住地被边缘的一种征兆。

对戴小华的父母而言，这种断裂和漂泊的感受成为他们一生的羁绊。想要回家的心愿，有家归不得的痛苦一直环绕在他们的心中，包括了无法与亲人相聚的遗憾。例如戴小华的母亲忍受了多年的思乡之苦，终于得以在1992年回家乡扫墓时，她哭着跪倒在父母坟前，一直叨念：“女儿不孝，从来没有尽过一天做女儿的孝道。从今以后，我会常来看望您们，死后也会永远守护在您们身边。”<sup>46</sup>两岸的相隔如同鸿沟，一旦有机会返回原乡，理智瞬间被击垮，让读者刹那间感受到被放逐多年，流放者强烈的哀痛。

远离家园的感伤尽数在无根漂泊的状态中得以表达，展示出了不同层面的精神特质：“渴望归去的心态、回不去的幻灭、扣判的文化立场、冷静而玩味的审视等，都凸显了该主题囊括之下复杂而多变的中国情怀。”<sup>47</sup>在两岸隔离的几十年里，戴小华与家人在台湾生活，与大陆家人相隔两岸，归家始终戴家是离开内心最大的渴望。虽然他们与原乡仍用同一个国号，飘扬同一面旗帜，但是脚下踏着的这片土地却不是自己的精神故土，理智在认同台湾和精神大陆中来回拉扯。介于台湾特殊的日据殖民

---

<sup>45</sup> 简政珍，〈放逐文学——台湾放逐文学初探〉，页18。

<sup>46</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3。

<sup>47</sup> 李亚萍，《故国回望——世纪中后期美国华文文学主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页95。

地背景<sup>48</sup>以及国共分治的历史因素，导致流放者陷入更为复杂广泛的历史脉络，生活无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更彰显了由心而余力不足的可悲。

当流放成为历史，原乡得以复原，被放逐的精神是否得到救赎？戴小华在《忽如归》中，以返乡作为结尾，漂泊多年的流放者终于回归故土，兹在下一节详谈。

## 第二节 “归”之想象与憧憬

《忽如归》在对家族的追忆及探寻归结其核心可以概括为一个“归”字。为小说作序的王蒙，认为戴小华将超越国界、超越地区，甚至是超越生死的体验写进了《忽如归》，“家园，对于她来说，是故土，是亲人，是国家，是心灵的归宿”<sup>49</sup>。“归”不仅是身体的回归，更是灵魂的安顿和宗教的皈依。政治把数百万大陆儿女流放到台湾岛，其中大多数人都对“归家”抱持着希望，盼望着回到故土的那天。戒严以来数十年，没能收到家人的任何音讯，饱受骨肉分离、思乡之苦，是何种煎熬？两岸交流的，亦是思乡的闸门，再也无法关闭，通向故乡的路变得不可阻挡。1987年11月，台湾开放返乡探亲。因此，1949年撤退来台的外省族群，盘踞了近40年的返乡念头，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久经流放的戴家两代人亦是如此。因此，本节将叙述戴家在肉体、心灵甚至精神上的“回归”。

---

<sup>48</sup> “殖民”对于土生土长于台湾的中国人，是一个浑浑然的噩梦。1842年鸦片战争，中国被列强瓜分；甲午战后，一纸《马关条约》，不仅卖断台湾人的生存空间，也同时卖断台湾人的尊严；民族主义在日据时期遭强烈的蹂躏与毁灭。抗战胜利后，1949年国府撤退来台，紧随而至的资本主义蜂拥而上，形成另一形态的经济性、文化性殖民，台湾在被支配下，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属品。详见戴小华，《忽如归》，页66。

<sup>49</sup> 王蒙，〈序文〉，收录于戴小华，《忽如归》，页i。

## （一）肉体上的回归

自台湾开放大陆探亲伊始，隔越几十年的两岸开始互动，外省第一代人最先按耐不住。他们朝思暮想的大陆这片土地，如今终于等到归返之日。戴小华的父亲献身党国三十余载，兄弟六人中就有三人为国牺牲，在面对儿子戴华光的减轻刑罪之事也无能为力。所以当台湾解严，父亲就决定离开这个令她伤心的地方，返回家乡居住，希望过几年随心所欲，无牵无挂的日子。<sup>50</sup>父亲有愧于自己没能在家乡和父亲兄弟姐妹一起分担这些苦难，所以回到家乡后总想要做些补偿，就将自己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拿出来帮助亲戚，捐助戴庄子小学，修建清真寺。似乎觉得唯有如此，才能弥补他对家乡亲人的亏欠。<sup>51</sup>父亲一生戎马，效力党国，却因为政治分裂离开台湾，常年流连于祖国的山水之间，最后因病去世，和妻子安眠于故土。

书中另一位主要人物——母亲回秀真，乐善好施、相夫教子，对儿女尤其是大儿子戴华光更是疼爱有加。戴小华一开始就点明母亲忍受了多年的思乡之苦，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到河北沧州的家乡安葬，否则不光母亲的灵魂无法得到安葬，这也会成为戴小华姐弟之间的痛。无奈，当时两岸尚未能通航，遗体从台湾运回大陆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手续繁杂，加上时间紧迫，这事件几乎无法办成。面对这一困难，戴小华调动一切资源和人脉，例如麻烦圆神出版社的老板简志忠，希望透过对方在台湾广大的人脉可以找到将母亲遗体送回大陆安葬的方法。之后，不仅找到了愿意运载遗体的物流公司，和大陆政府协调好出具允许母亲回乡安葬的批文，还成功请求台北市警察局把安检的时间提前，让母亲可以在七天之内顺利入葬。最后，戴小华等人终于如愿完成母亲的愿望，将遗体送回大陆安葬。

---

<sup>50</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111。

<sup>51</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197。

此外，戴华光原被囚于绿岛监狱，随着台湾宣布解严得以提前出狱，却拒绝领取补助金，决心不再插手政治之事。戴华光常陪母亲其身，意识到如果要随侍母亲身旁，就必须要做一点小生意来养家。和戴小华商量之后，戴华光决定经营西点蛋糕生意，1992年在台北县一所食品工业技术研究所学习制作面包点心。<sup>52</sup>1993年4月，戴华光就在沧州市荷花池租处现训练了四个员工，同年11月开始营业一家烘焙店。<sup>53</sup>在面包店有了名气之后，戴华光拿出盈利的百分之二十，成立了“回秀真教育基金”，专门帮助家乡贫穷学生。原本因为女友的事情，戴华光对婚事已经看淡，只想尽孝。怎知之后遇见一位善良能干的女职员小萍，两个人相互产生好感和爱意，便在沧州成家立业了。他最终回到父母的家乡沧州扎根，守护那一片祖祖辈辈留下的故土和父母的安息之地。戴小华的小弟后来也到北京工作，并和一位山东青岛的姑娘结婚生子，婚后长居北京。不仅如此，戴小华的大姐也在沧州买下了墓地，戴家成员都以不同的方式，回归大陆这片故乡。

## （二）心灵上的回归

戴小华叙述的心灵上的回归，主要彰显在其母亲追认回戴家在沧州的原生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并由此宗教的回归，去陈述精神上的回家，达至心灵乃至精神上的归依。迁台后，戴小华的父母为了不连累家人，而有意隐瞒了身份和信仰。此外，国民政府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穆斯林教徒很少，清真寺也就更少了，故只能把承自祖先的宗教信仰搁置一边。然而，身在异乡的苦闷与无助，让母亲常到教会去祈祷，“适逢基督教积极传教，我听着竟有许多和伊斯兰教的故事一样，就常去听道，其实

---

<sup>52</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112。

<sup>53</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112-113。

也只是想寻求心灵上的慰藉和结交一些朋友。”<sup>54</sup>宗教信仰的迷失，一直到母亲回到沧州老家时，才恍然意识到，因此想要寻回宗教上的回归。“母亲是因为没有让子女从小就得到伊斯兰教信仰的熏陶，因而使我们对教门知识一窍不通，她为此不断受着折磨，谴责自己。”<sup>55</sup>而后母亲遽逝，戴小华以正式的穆斯林仪式帮母亲洗礼并安葬，母亲的灵魂在时代的流离中因为宗教的皈依而安归。

戴小华钜细靡遗地描写穆斯林葬礼过程。从洗（礼）、穿（‘可凡’，即殓衣）、站（善面）、埋（葬）等，展现了穆斯林葬礼严谨严肃的安葬仪式，更添增几分宗教色彩的神秘感。“他们三人间母亲从棺椁中抬出，放到‘旱托’（水床，俗称‘水溜子’）上，脱去其衣，用一块白布遮住羞体，开始为母亲做‘阿布岱斯’（小净）……小净之后是大净，全身冲洗三遍以致看不到污秽为止。”<sup>56</sup>戴小华运用大量笔墨详细描写洗礼过程，展现了穆斯林宗教的庄重和对其的尊重，同时也凸显了母亲在完成仪式之后，浮沉漂泊的心灵终于得到回归——回到真主的怀抱。母亲在做完“爱斯里”后，戴小华和姐弟向母亲“善面”<sup>57</sup>，惊讶发现母亲原本皱着眉，撇着嘴，一副饱受委屈的样子，瞬间消失，而像熟睡在母亲怀里的孩子似的，那么恬静安详。<sup>58</sup>由此可见，母亲在心灵得到安归之处时便是心安魂定，生前因为曾经远离主而犯下的罪过也能在神圣的洗礼中被洗净，灵魂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之后再次回归真主。

---

<sup>54</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134。

<sup>55</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133。

<sup>56</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143。

<sup>57</sup> 洗礼仪式妥当之后，亲属好友向亡人作的最后一次告别。详见戴小华，《忽如归》，页145。

<sup>58</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145。

### （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戴小华开篇便提出曹植的《白马篇》：“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sup>59</sup>，其实是借此诗赞赏戴华光的爱国行径。年轻一辈的人总要为了国家站出来，有着视死如归的精神。戴华光在成年之后赴美留学，机缘之下接触了一些台湾的“禁书”，书中反映的大陆面貌和台湾历史让戴华光深感两岸分离之痛，他看清楚了美国政府的真面目，那就是他们企图将“两岸分裂的现状固定化，永久化，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最终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sup>60</sup>。因此，戴华光就确立目标，势必要两岸和平，不掉进美国设下的陷阱之中。他回台湾的目的就是设法唤醒台湾民众不再受制于处心积虑的美日帝国，希望他们滚出台湾，中美尽快建交。只要台湾人失去美国做靠山，就无法“反攻大陆”，两岸才有“和平统一”的希望。<sup>61</sup>因此，就算戴华光被判定为“人民解放阵线”首领，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囚于绿岛监狱，更被多次投入黑牢，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但他还是进行种种抗争，“发誓要死也要死在两岸统一之后”<sup>62</sup>。

戴小华提过，“‘爱国’在那个时代是个很痛苦的词，而大弟只是一个走在时代巨轮前的悲剧人物，在这个历史激流转弯过程中，不幸仆倒的爱国青年中的一个”<sup>63</sup>。这样言简意骇的句子，隐藏了多少爱国青年的悲凉无助，他们为了两岸和平统一或被逮捕关押，或为国捐躯，但浓烈的爱国意识并没有就此消散。戴小华特地引用了故乡河北沧州的铁狮子“镇海吼”来衬托弟弟戴华光勇敢坚毅、视死如归的精神：“当年

---

<sup>59</sup> 【三国】曹植，《四部丛刊初编·卷六：白马篇》，中国哲学电子书计划，阅自2022年4月13日，<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324330&remap=gb#白马篇>。

<sup>60</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60。

<sup>61</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61。

<sup>62</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103。

<sup>63</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66。



沧州一代地处九河下稍，由于渤海蛟龙作怪，洪水灾害连年不断，经常颗粒无收，民不聊生。于是山东有个叫李云的铸工来到这里，倡导铸铁狮以镇水患……千百年来，历经洪涝、地震、战乱、风吹雨淋，吼得嘴已破烂，身被摧残，他仍勇敢坚毅地坚守岗位。”<sup>64</sup>因此，“铁狮子”的形象成为戴家、乃至沧州人民“家国”之爱的精神象征。

在当时的台湾政治处境之下，“中华民国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就是死刑。<sup>65</sup>戴华光被关押监狱期间，多次为狱友申诉而被关押黑牢，却仍不放弃宣传和平统一，“宁愿牺牲爱情、婚姻、孩子、家庭和自己的性命”<sup>66</sup>。戴小华在书中穿插一段看见蝙蝠群体出动觅食的场景：“因为有老鹰等在洞口伺机捕杀，所以每次蝙蝠出洞，必有一些愿意牺牲自己去喂饱老鹰的先行者，才能让其他蝙蝠安全出洞。”<sup>67</sup>她在当下深深为之震惊，回味过后便是赞叹与感动。戴小华引用司马迁所著《史记·刺客列传》，吟咏“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sup>68</sup>，借用各种典故与意象，强化戴华光对家国的责任感和甘愿自我牺牲的高尚情操，“就是因为有许多像大弟一样愿意牺牲的先行者，台湾最终才能完全解严解禁，两岸同胞才得以相聚。”<sup>69</sup>正是因为有这些牺牲者，两岸关系终究回归历史，回归平静。

---

<sup>64</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118。

<sup>65</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61。

<sup>66</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75。

<sup>67</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75。

<sup>68</sup> 【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国哲学电子书计划，阅自 2022 年 4 月 3 日，<https://ctext.org/shiji/ci-ke-lie-zhuan/zhs>。

<sup>69</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76。

### 第三节 走出白色恐怖：平复创伤的渴望

《忽如归》并不是只见证不义，诉说伤痕，更是一本感恩之书，感谢在戴家最困难的时候对他们伸出援手的人。戴小华作为感恩者，强调在暴力的彼端，更有强大的救赎力量——家族的、社会的，甚至宗教的——值得诉说，而这些将建立在伤疤上，平复创伤。往事不堪回首，即使要打开详谈，也有不知从何谈起的困难，失语的痛苦不但来自外部的压力，更是因为当事人内心挥之不去的创伤。因此，走出白色恐怖最主要的意义不仅在于挖掘、哀悼那曾经使人失语或痛苦的历史记忆而已。哪怕暴力带来的恐怖难以诉说，戴小华也坚持要说出这恐怖的“难以诉说性”，以为抗衡。正如戴小华在北京发表《忽如归》时提及自己创作这部家族纪实小说的初衷，“我并不想只是述说伤痛历史，而更愿意强调受难者和受难者家属在陷入极度孤绝和悲痛中，有着一股强大的救赎力量，也就是‘爱的力量’。”<sup>70</sup> 戴小华以印记来刻画国家动荡不安的历史现实，想象家宅意象寻求亲密和幸福之感；用家族成员的良善、坚毅去对抗历史的冰冷，在这个根基上构建爱的力量去平复历史创伤。这两点，笔者将在下文加以阐述。

#### （一）“家——家族”的意象意涵

戴小华家族书写中的伤痕主要体现在两件历史事件——父母被放逐到异乡，大弟被关押在牢。苦难是无法避免的，在时代的巨流中流淌过的每一件历史事件都有缘故，因此人们为了对抗伤痕带来的悲痛，只好幻想出家宅的意象，让自己居住其中，保护并添加居住者的幸福和亲密感。现实生活中亲密感的缺失，此时就需要象征安全和温暖的家来填补，外部世界的攻击加强了家宅的安全感和身处其中的幸福感，家宅

---

<sup>70</sup> 杜碧媛，〈从《忽如归》到《因为有情》——戴小华中传行暨“海外华文文学助力文明”对话〉，页16。

给予的庇护价值更加明显的显现出来。同样的，家宅中包含的家族成员也可以缝补亲密感的失落。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提出“空间的形象”，是承载人类意识的空间，归纳起来可分为家宅和角落的空间；抽屉、柜子和箱子的空间；鸟巢和贝壳的空间，称之为（topophilie）。<sup>71</sup>其中，家宅代表着“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想融合在一起，它保佑着梦想，家宅保护着梦想者，家宅让我们能够在安详中做梦”<sup>72</sup>。换言之，家宅承载着人类的“保护性”的意识，它隐喻着私密空间，人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幻想出家宅，在家宅中注入相关回忆，在意识受到外来伤害之时便可以躲入其中，抽取关于“幸福”的回忆，以寻求身心上的亲密感。

《忽如归》中有关于“家”的描写，便是在板桥一个三合院的房子，房子的主人是当时台湾的首府林家。母亲刚随着父亲迁台，带着五个孩子孤苦无依，而他们住的那条街上只有他们是大陆迁徙过来的，也就是别人嘴里的外省人。因此，母亲“唯一的去处就是林家花园，因为院内的亭台楼阁里住满了和母亲一样的天涯沦落人”<sup>73</sup>。林家阁楼带给母亲的是安全感，其中的人共同对故乡的盼念，带给彼此心灵上的慰藉，甚至是幸福感。吸引母亲一直不断回归林家花园的是什么呢？巴什拉说，“内心空间的存在是幸福的存在”<sup>74</sup>。因此，戴小华描写花园，真正谈论的不仅仅只是花园本身，而是花园带给母亲的愉悦感和幸福感。母亲原本是深宅大院的千金，流离原乡之后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就连自己的丈夫也常常不见踪影。母亲时常会幻想出亲人在身边的情景，“等我们回大陆之后，你们就不会被欺负了。家乡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

---

<sup>71</sup> 黄文娟，《空间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兰州：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12），页9。

<sup>72</sup> 加斯东·巴什拉著，张逸倩译，《空间诗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页5。

<sup>73</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22。

<sup>74</sup> 加斯东·巴什拉著，张逸倩译，《空间诗学》，页11。

舅舅叔伯们，一定会好好疼你们的。”<sup>75</sup>由此可见，亲密感的缺失会让母亲失去安全感，所以才会设法幻想出一个幸福的空间来弥补现实对于亲密感的失落。

除此之外，在巴什拉家宅的心理学中，家宅被想象成一个垂直的存在，一般建筑物会有从阁楼到地窖这样的垂直结构。地窖是对我们垂直意识的一种呼唤，也是潜意识的安居之处。在巴什拉看来，地窖往往带来阴暗和恐惧感。当我们把阁楼和地窖与人类的心灵和感知结合起来时，冰冷的家宅注入具体的情感记忆：阁楼是充满幸福、亲密和梦想的，而地窖充斥秘密与愤怒，一个人的情感空间体验于焉而生。在《忽如归》中，地窖的形象就是监里的黑牢，阴冷而恐怖：“在一个不到四平方米的狭窄空间，完全见不到天日，分不出白天黑夜，地面又是潮湿的，独自一人‘面壁思过’……除非意志力特别强大，或者身体底子好，或者求助神明，否则很难熬过去，有些承受不住的出了黑牢就疯了。”<sup>76</sup>戴华光在监狱中的精神状态不佳，甚至有狱友认为他疯了。他在这个冰冷的空间渴望亲密感，想要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寻求幸福，于是他不断给家人写信，从家人的身上得到活下去的力量。小弟因此会常常与他通信，多是报喜不报忧。

那么，地窖意象的恐惧感，是否与巴什拉提出的幸福空间产生矛盾？其实，采用地窖这个隐含阴暗的空间作为幸福意象的一员，这让幸福空间和阴暗空间产生一种同源异形的关系，甚至在拥有幸福空间之前，人们必须有身处阴暗空间的经历。正如上文提及，地窖存放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正是因为有了创伤，潜意识才会被激发，创造出阁楼填补内心的空缺。这时候的阁楼，会因为保存私密且幸福的回忆，成为灵魂快乐的住处。戴小华对亲密感的追求，隐藏在想象中的家宅和家族成员中，而亲密感

---

<sup>75</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21。

<sup>76</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88。

也可以转化成爱来缝合历史带来的创伤。关于家族成员给予的爱力量，笔者将在第二小节详谈。

## （二）以爱平复创伤：家族成员爱的力量

正如前文提到，戴小华将整个故事结构设置成一个接一个的嫌疑，一层一层慢慢将其剥开，从容淡定地“撕开”创伤，让读者感同身受人物的情绪、处境乃至内心世界。在种种有关迫害、离散、监禁、或死亡的叙事中，亲情的叙述——家族和手足的呵护之情，子女的孺慕之情，为冰冷的历史注入一股暖流。《忽如归》这部小说的最后，所有唤起的欢乐、痛苦、激情、哀乐等等复杂情感最终将会回归平静，来自家族成员的爱愈合一切伤痕。

戴小华在小说的开始就描写了与亲族的血脉联系是她愈合创伤的因由。1990年4月10日，在马来西亚与中国民间还不能自由往来时，戴小华独得机缘，被官方批准成为第一位能公开正式访问中国的“文化使者”。<sup>77</sup>作为中马两国之间交往的“破冰之旅”，她回到隔绝半个世纪之久的原乡，与亲友团聚。当再次见到故乡的亲人，血缘割开时空的隔膜，“所有的思念，悠忽浓缩在这一刹那之间”<sup>78</sup>。舅舅叮咛戴小华要常回家，堂嫂给她塞满土特产，夜里堂哥踩板车送她上车站，这都让她深深感受到家族带给她的温暖与爱。即使戴小华出生于台湾，在台湾成长，之后更远嫁马来西亚，对于大陆的土地，河北的原籍，仿佛都只是个遥远的名字。但是，在她第一次踏上大陆这片土地，与父母离开四十多年，素未谋面的亲人见面时，血脉间流动的悸动却是

---

<sup>77</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8。

<sup>78</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9。

如此深刻。血脉将大陆和台湾的亲族紧紧联系起来，沧州的亲人对自己的爱，是戴小华发声的力量之一。

此外，戴小华把其母亲塑造成一位平凡又伟大、勇敢与坚毅的形象。戴小华的父亲经常行踪不明，母亲傲然独立，教养四个孩子，为了自己的孩子即使再多么辛苦都没有任何怨言。在儿子戴华光被关押在绿岛监狱之后，母亲不辞劳苦，每个月都去抗争和探监。母亲不畏惧强权，在儿子被关押后身披写着“请释放我的儿子戴华光”的白布背心，静坐在立法院前。<sup>79</sup>戴小华陪母亲到监狱去探望戴华光时，狱守总是不让见。母亲总会据理力争，甚至呐喊“如果再不让我见到我儿子，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sup>80</sup>。母亲坚挺脊梁的愤怒反击和以生命抗争的言行，对已经绝望的儿子是一次次生命之爱的唤醒，直到在各界声援之下，儿子在服刑十一年后终于获释。

再者，戴家一开始迁徙到台湾，因为是外省人的身份，少不了被本省人欺压。戴小华小时候在板桥，戴华光被邻家妇人欺凌而受伤，母亲气的“回家拿了菜刀，就站在那个邻居的门口骂起来……我从未见过母亲如此愤怒，她全身战栗着，一张脸涨得通红。邻居知道过分了，连门都不敢开”<sup>81</sup>。母亲向来谦虚温和，为了儿女却勇敢坚硬地去抵抗的形象，展现了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正如前文提及深具沧州人所怀有的刚柔并济的风骨与性格。

戴小华的父亲原本是“国防部总政治部”高级参谋。<sup>82</sup>为政党鞠躬尽瘁，升任少将前夕却被别人走后门抢走职位，对政党之黑暗已经心灰意冷。之后和伙伴搭档做生意，父亲还被蒙骗，退休金全数被骗光，还欠下一身债。为此，大姐休学唱歌赚钱，

---

<sup>79</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52。

<sup>80</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86。

<sup>81</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21。

<sup>82</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22。

帮忙养家还债；二姐去了不用交学费，还能给些津贴的政工干校女青年工作大队。<sup>83</sup>即使父亲出事，家庭成员也没有责怪之意，反而是想尽办法为家庭尽一份力，尽显家人伟大且包容的爱。

不光如此，戴华光的政治犯身份对全家人，尤其是其小弟的就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过不了政审，所有的政府部门、国营企业、教育机构和新闻媒体都不录用他，甚至一些民营商家也不敢录用，他只好在家里为出版社做了三四年的翻译工作。在戴华光入狱的十多年间，小弟的生活重心几乎都和他有关。他每一个星期都与戴华光通信一次，告诉他家中近况，帮他买他想看且被允许看的书，还帮他买各种药物。<sup>84</sup>更重要的是，小弟千里迢迢带着母亲，每月一大早从台北松山机场搭机去台东，然后转乘八人座小飞机飞往绿岛，下机后再搭车前往绿岛探望大弟，然后赶在当天再回到台北。<sup>85</sup>大弟从来没有怨言，即使每一次的监狱探望都花掉他近半个月的薪资，但是他还是没有落下探望戴华光的机会。大弟对戴华光无私的兄弟之爱，愈合了戴华光的伤疤，历史带来的创伤总会在家人爱的光芒下痊愈。

---

<sup>83</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22。

<sup>84</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69。

<sup>85</sup> 戴小华，《忽如归》，页 69。

## 第四章 结语

戴小华《忽如归》所涵盖的时代背景，主要包含了从 1949 年至 1987 年台湾实行的戒严时期，大陆迁台者和台湾人都遭受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时期或各种时期的政治迫害。台湾“解严”之后，历史控制权逐被瓦解，大陆与台湾的家族回忆相交织，家族记忆争纷涌现复调历史。家族书写同时展现了闭合又开放的特征：对内塑造家族人物，展现家族的兴衰起伏；对外与时代连接，折射历史风云。

在家族书写之叙事手法方面，笔者发现戴小华在呈现家族小说所反映的历史事件之中带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感受。戴华光事件，是一种政治权威和暴力加诸于肉体 and 心灵上的摧残和肆虐。身份之伤便是戴华光失去了普通人民的身份，成为了罪犯；身心之伤则是从身份之伤衍生而来，除了戴华光的精神遭受巨大冲击，身体日渐衰竭，另一方面更造成母亲的日夜申冤，劳神费力、大姐的家庭破碎、弟弟求职被拒。戴小华以揭发这件被屏蔽的历史伤痕作为《忽如归》创作初衷，通过伤痕掀开历史带给家族的伤害。然而，笔者发现即使是书写伤痕，戴小华仍然是冷静、理性和充满客观的，特别是在追索戴案之来龙去脉，就为了要完成这部纪实性的小说。戴小华通过与家族事件相关的图像、史籍，家族成员之间的通信甚至是日记，严谨缜密地去厘清历史，甚至会亲身赴旅寻找家族陈迹，也会寻找当事者访谈来还原历史的来龙去脉。如此严谨的求真过程让笔者由衷赞叹。

在家族书写之主题意涵方面，笔者发现，对于戴小华的父母而言，台湾虽然居住了那么多年，但潜意识仍把大陆当成永远的精神原乡，从离开大陆那一天起精神就开始被放逐，《忽如归》展现了他们的心灵羁绊，对于家国的缅怀和向往。在〈“归”



之想象与憧憬》中，笔者发现小说的核心是“归”，戴家所有成员都可以代表着肉体上的回归，例如母亲的遗体被送回大陆，两个弟弟回到大陆定居工作，大姐也在沧州买下了墓地。戴小华的母亲在葬礼上追认回原生伊斯兰教，这也是书中表现的心灵上的回归。此外，“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主要体现在戴华光誓死如归为国抗议的行为。

透过研究主题意涵，笔者也发现戴小华希望由揭开伤疤来走出白色恐怖带来的创伤，也有想要以爱平复创伤的渴望。戴小华通过“家宅”和“戴家成员”的意象，展现出一个想象的幸福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去追求本身缺失的亲密感。“地窖”是阴暗空间，保存着人们的潜意识，一旦潜意识受到创伤，人们就会开始渴望，想象出幸福空间让自己居住其中，以回到“家”的盼望来得到安全感。戴小华更以爱来平复创伤，家庭成员爱的力量是戴小华发声的支柱。

此外，笔者也发现戴小华独特的写作手法，便是塑造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形象，他们在戴小华的笔下鲜明，栩栩如生。戴小华以日常生活去展现家族成员在历史浪潮中的真实人性，例如戴华光，被关押在黑牢里也宁折不屈，他说理、反抗、绝食、踢破牢门、种种挣扎，就是为了维护尊严、价值与理想。正因如此，戴华光主体的地位被突出，戴小华对其的描绘窥探出背后发生的事件，更可以看见其中社会与历史的变故。

## 参考书目

### 专书

戴小华，《忽如归：历史激流中的一个台湾家庭》，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海登·怀特，《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蒋蓝，《踪迹史》，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李亚萍，《故国回望——世纪中后期美国华文文学主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若林正文，《战后台湾政治史：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历程》，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

王德威，《一九四九：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08。

王先霏、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译著

罗兰·巴特著，赵克非译，《明室：摄影纵横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加斯东·巴什拉著，张逸倩译，《空间诗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 学位论文

黄文娟，《空间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兰州：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12。

李敏，《“伤痕”与“反思”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济南：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朱云霞，《“解严”以来台湾文学中的家族书写研究》，南京：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2012。

## 期刊论文

杜碧媛，〈从《忽如归》到《因为有情》——戴小华中传行暨“海外华文文学助力文明”对话〉，《名作欣赏》2019年第8期，页15-22。

简政珍，〈放逐文学——台湾放逐文学初探〉，《中外文学》1991年第6期，页4-24。

李媚，〈美貌与才华——马来西亚女作家戴小华小传〉，《东南亚纵横》2001年第5期，页44-45。

王德威，〈从吞恨到感恩：见证白色恐怖〉，《中正汉学研究》2012年第1期，页1-12。

王红旗，〈用爱“缝合”被撕裂的“家国痛史”——谈马来西亚华裔女作家戴小华的“非虚构”长篇新作《忽如归》〉，《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页82-86。

王艳芳，〈“真”的回归与“爱”的唤起 ——论马华作家戴小华长篇小说《忽如归》〉，《名作欣赏》2019年第4期，页88-91。

吴宥霖，〈从法治国原则论台湾戒严时期制定特别法与审判之探讨〉，《台湾海洋法学报》2017年第25期，页113-143。

辛金顺，〈戴小华《忽如归》的创伤记忆书写〉，《蕉风：政治与文学专辑》2019年第512期，页63-70。

## 新闻或杂志文章

倪子修、吴祚丞，〈戒严时期处置叛乱犯之特别实体法及程序法〉，《台湾人权与政治事件学术研讨会》，2005年12月8-9日。

## 电子书

【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国哲学电子书计划，阅自2022年4月3日，  
<https://ctext.org/shiji/ci-ke-lie-zhuan/zhs>。

【三国】曹植，《四部丛刊初编·卷六：白马篇》，中国哲学电子书计划，阅自2022年4月13日，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324330&remap=gb#白马篇>。